

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范蔚文

摘要：本文概括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些特点和趋势。文章提供一个观察和展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从生产、建构到传播、扩展的过程。本文认为，形成有一套独特概念和方法构成的解释自身和世界以及他人和世界关系的理论体系，是理论构建关键的第一步。中国特色既不意味着封闭排他，也不意味着其没有世界意义。要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从特殊转化为一般，就需要主动让更大范围的学者去使用、检验这个理论，理论就会从特殊转为一般。文章由此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化问题，认为在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化是指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如何同外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在外国实现本土化的过程。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理论的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7)06-0001-12

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在经过 20 多年引进、消化外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努力走在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前列，开始立足自身，主动对外来理论成果进行转化和提高，

* 2017 年 6 月 24-25 日，作者参加了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2017 年理事会议暨纪念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三十周年会议”，这次会议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发展”为主题，百余位知名专家学者、理论工作者齐聚一堂，热烈的讨论激发了作者的思考。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出版行业工作者，结合自身工作，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形成了一些认识和想法，特行文于此，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对本国外交重大实践和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在同外部世界的交流中,也开始日益引起外国学者的重视和关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化是一个新现象。本文按照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线,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些新特点和趋势做一梳理和概括。

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自觉

在中国的各门社会科学中,国际关系学界较早明确地提出了要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1987年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多位专家学者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此后的三十年间,探索具有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学者努力的目标。

应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工作者就以高度自觉的态度,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体系。今天人们在梳理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界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学术历程的时候,应该承认,在1949—1978年期间,中国就以高度自觉的态度,在处理同世界的关系上形成了一些思想理论和战略学说。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就已经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周恩来说:“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经验的,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新中国外交在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和非殖民化运动中,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体现了矛盾论在分析国际政治中的智慧和哲学。在那个时期,中国还提出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大小规模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学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判断,体现了中国在科学把握世界情况基础上,对世界发展大势准确的理解和判断。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当时激烈对抗的冷战环境下,能够先知先觉地做出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判断,并敢于将这个判断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开展的前提,这是需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判断勇气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流行于苏联和美国的主流理论还是冷战对抗学

田志立:“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综述”,载《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6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说。可以说，中国率先冲破了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中国的选择对后来冷战的结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之所以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特定的学术背景。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开始逐步被介绍到中国，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倪世雄是国内系统地介绍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当时欧美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几乎被国内学界同步翻译介绍过来。在那个时期，不仅是国际关系学，其它社会科学都提出要抓紧补课的任务。面对这样一个引进浪潮，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并没有在引进中迷失方向，而是在对外来成果自觉地反思过程中，看到了西方理论的局限性和不足，倡导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成果。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性原则。这个指导性原则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在面对外来成果的时候，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有保留地吸收西方国家的理论成果，而不是全盘照搬。

进入新世纪以来，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同自觉。在中国社会科学门类中，国际关系学界是同外界保持最为密切接触的一个学科群体，这个群体总体来说国际交往多，对外部知识感知敏锐，国家利益观念强，对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自觉意识。20世纪90年代一度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引起广泛讨论的美国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也就是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逐步淡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美国重心在不可逆转地式微和失重，学术期刊、研讨会中利用美国三大主义研究国际关系的文章在显著下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成果的新鲜感今非昔比。这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成熟、开放和进步的表现。随着中国崛起，更多学者的思考开始从过去“外部世界对中国影响”的模式，向“一个崛起的中国会对外部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模式转变。中国全方位开放的外交格局，特别是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又驱动学者在看世界的时候，摆脱欧美知识带来的片面影响，力图形成自己对世界的独立判断和理解。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界产生强烈反响。“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段话振奋着包括国际关系学科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奋发进取，积极有为，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为世界提供了许多来自中国的理念和方案。这些理念和方案有来自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间接知识贡献,像“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结伴不结盟、新发展观、共商共建共享、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已经成为人们分析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词汇和概念。

有关出版社和期刊社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成果的发表搭建了很好的平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推出了“当代国际政治丛书”,是目前国内影响最大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丛书,丛书出版20多年来,已经出版近30种著作,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研究水平。2007年,上海外国语大学首次召开了“全国国际关系类CSSCI期刊办刊学术经验交流研讨会”,后来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的支持下,学会下设的中国国际关系期刊研究会于2016年成立,超过40家国际关系研究期刊成为会员。综合类研究期刊如《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问题研究》、《国际观察》、《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研究》、《当代亚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国际展望》、《国际安全研究》等都开辟专栏或者不定期刊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探索文章。可以说,出版社、期刊杂志积极自觉地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探索提供空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英文刊物逐年增加,以理论探索为主的综合类英文期刊有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国际政治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中国政治学评论》(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主办的《亚洲中东与伊斯兰研究》(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季刊》(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国际安全研究》(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等。

总的来看,中国学界一直倡导构建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放在世界范围来看,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和文化现象。冷战时期,美苏文化冷战本质是两套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之间的竞争,一度平分秋色;一些从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中独立出来的新兴国家,出现过文化自觉浪潮,试图摆脱文化殖民主义状态,但是并不成功,有的最终彻底放弃了努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探索形成自己特色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走过弯路,正在反思,这些国家的知识阶层将从西方学来的理论和概念照搬到本国本地区,最后形成的成果还只是西方知识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对于大多数规模较小的国家来说,也许根本没有必要去思考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的严肃问题。因此,中国学界一直强调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学术自

觉,其意义决不局限于理论体系的本身,而在于这一执着的知识追求过程本身会对世界文化和知识格局的变动带来深远影响。

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从1987年上海首次召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会议至今已经30年了。无论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还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这两个提法大致都认同以下几点:一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只有一门一派,而是非常丰富多彩;二是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意味着排斥外来的理论学说,更不是关起门来搞学术;三是中国特色理论并不意味着其只有特殊性,它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借鉴、启发本身,就意味着其具有一般性的意义。

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其范畴是什么?学界大致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底色是中国,所谓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既是指中国长期以来在处理与世界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概念、理论和思想体系,也包括中国学者在研究其它国家与世界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到概念、理论和思想体系。从出版传播角度看,或许可以将这个范畴进一步展开,也就是来自中国的对其它地区国际关系的独到理论和解释。其它地区学者利用中国学术创造的概念、理论对本地区国际关系作出解释的成果,也应该属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按照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这个界定范畴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大致出现几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关于中国长期以来在处理与世界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概念、理论和思想体系。这是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内涵最流行的理解方式,本质上这属于一种内在指向的、防御性的理论构建方式,着力于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经验和实践予以概念化、理论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成果大都可以归于此类。除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在对外关系方面形成的理念、思想、战略,学界围绕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代表性成果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学说,外交学院秦亚青提出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清华大学阎学通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金应忠、复旦大学苏长和、任晓等提出的国际社会的共生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均以中文世界人们生活中熟知的概念

赵汀阳:《天下体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任晓编:《共生》,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为核心,例如天下、道义、关系、共生等,构建一种对国际关系的解释观点,这些核心概念近年来开始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扩散效应。

第二,关于中国学界在研究其它国家与世界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到的概念、理论和思想体系。这一形式和下面阐述的第三种都属于外在指向的、扩展性的理论构建方式。本质上,这是从利用别人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和世界,到自己提出理论来解释别人和世界的转变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这方面一直在持续耕耘,积累了很多成果,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时代观和时代主题、国际格局变动、经济全球化等系统的看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用英文撰写论著。在这一趋势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中国学者撰写的国际关系英文论文主要集中在用欧美理论和概念解释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上。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中国学者在消化外部理论基础,提出自己对外部世界总体解释的宏观理论。复旦大学唐世平提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就是试图给出国际政治进化的一种系统解释。

第三,关于外国学者利用中国学者创造的概念、理论对本地区国际关系作出的解释。

在鼓励外国学者使用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研究自身和世界关系上,目前并没有形成有规模的学术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场合提出许多中国方案,这些方案背后的一些核心概念在国际上已经开始流行起来,以“一带一路”为例,其产生和扩散,带动了不少国家学者主动使用这个概念去观察自己与中国的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也是个例子,从一开始提出后美国不愿意接受,到近期美国接受这个概念,产生了中国概念在美国内化的效果。观察下来,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不少成果还是在使用欧美的概念和理论在解释问题,有意识地鼓励外国学者使用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研究问题的成果很

关于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梳理,参考王存刚:“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3期。中国社科院李慎明发表了很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文章,集中见于李慎明主编:《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南京大学李滨对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北京大学王正毅提出的边缘地带发展论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学界,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也很明显,也就是为了追求英语发表,使用欧美理论和概念来解释中国实践,中国丰厚的实践材料最后成为欧美理论的注脚和案例。

唐世平著,董杰旻,朱鸣译:《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少。这也许是下一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传播需要重视的问题。

鼓励外国学者使用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研究问题,既需要本文第三部分强调的战略性地培养外国留学生资源,同时更需要中国学者有意识地深入到其它国家内部,在研究别人的过程中提出概念和理论,如果别人觉得是合理的、有用的、解释有力的,这类概念和理论就会被别人主动借鉴和使用。从出版社和学术期刊发表的论著上看,在研究他国与世界关系问题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存在以下几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一是过多依赖英语文献研究母语为非英语的国家,缺少自己独立的在深耕他国国情基础上积累的独立的数据材料;二是简单借用英语学术界关于母语为非英语国家研究的概念和理论,导致出现英语学术界怎么说别人、我们就跟着怎么说别人的现象。例如,英语学术界说某某国家是威权国家,我们也跟着说这个国家是威权国家,然而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可能并不是“威权”概念所能界定的;三是在研究他国过程中,缺乏能够对别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成果。

近年来,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去,中国甚至开始参与到一些国家发展规划的制订过程。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出版社和学术期刊突然意识到过去出版的关于“一带一路”国家的研究成果很少。就此来说,“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国别和地区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遇。

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化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补课说”,也就是说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同国外相比落后了,要抓紧学习和补课。一个国家的思想界和知识发展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补课”阶段,补课是为了超越,最终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主张。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整体水平取得了长足提高,现在正在告别“补课”阶段,进入到一个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自我伸张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或许可以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化”来界定。

一段时间内,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提法存在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只要是理论,就是普遍适用的,没有特色之别。第二种看法认为,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政治学理论,往往都是对特定实践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时代和国家特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普遍适用的,只不过在传播的时候用普遍性词汇进行包装和修饰而已。就此

吴晓明:“中国学术要有自我主张”,载《人民日报》2017年6月19日。

意义而言,也可以用“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对美国的理论进行限定。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开始出现的第三种看法,也就是在对中国内外关系实践基础上概括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以后,用中国理论去解释世界,并鼓励外国学者使用中国概念去分析自己和世界现象,这就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化的过程。

第三种看法涉及一种理论或者理论体系从特殊到一般的转换过程。这里首先需要正确认识“国际化”这个词。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往存在一种倾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国际化就是用英语发表、用西方概念和理论解释中国外交实践、使用英语教材等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这种国际化现象进行反思。实际上,这是一种被动的国际化。因为很明显,如果一个国家的学界仅仅停留在用别人的概念和理论开展研究的话,是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而且在这样的学术交流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学术依附,其学术表面上看“国际化”了,实际上还是处于学徒状态,或者是在为别人打工。因此,本文所说的“国际化”,则特指中国独特的元素被外部世界接受、使用的过程。

第三种看法代表的是更为能动和主动的国际化过程,“国际化”不再是完全照搬或者接受别人的理论,而是如何让自己有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在别人了解和使用的过程中传播出去。这种视角的转换可能会对下一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对国际关系理论人才培养模式带来变化。

回顾西方知识在西方之外世界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也许更能够加深我们对第三种看法的理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首先是在研究自身国家和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基础上产生,由此形成由一系列概念、推理、结论组成的各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西方特色的知识。之后,随着其它国家学者到这些社会科学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留学交流,慢慢地将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介绍到本国,并使用这些西方概念和理论分析本国现象,从而既完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本国的本土化过程,同时完成了西方特色知识从特殊到一般的转化过程。因此,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西方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并不是用西方之外的语言发表、用西方之外的概念和理论研究自己,而是让外部世界使用西方概念和理论研究社会现象。了解了这一知识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国学界经常说到的“本土化”,实际上也要有所反思。在国内学术语境中,“本土化”的意思更多说的是外国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这实际上帮助外国理论在中国的扎根,抑制了自身的理论创新创造。真正的本土化,应该是中国国际关

系理论与他国和地区具体国情和区情结合起来,在外部世界实现本土化的过程而国际化,应该是让外部世界了解和使用中国概念和理论研究分析问题。

第三种看法真正代表着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化过程。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以秦亚青的关系理论为例,说明这一知识国际化的过程。关系理论是秦亚青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外交实践基础上概括出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近年来,这一理论开始被国内其它学者所使用,来分析关系在建构中国和它国关系中的意义。然而,这还只是理论传播的第一步。一种理论要有国际影响,还需要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平台加以传播。《关系与过程》是秦亚青关系理论的代表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充分认识到该著作的理论意义,积极推动该书的“走出去”,目前《关系与过程》已经被享誉国际学界的“剑桥国际关系系列丛书”收入,成功实现了理论国际化的第二步。接下来,还有重要的第三步,即用他国的经验来验证和支撑,这就需要发现其它国家对外关系中是否也存在秦亚青关系理论所述的现象和特征。换句话说,作为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关系”,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这就如同“权力”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理论的一个特色概念一样。当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也开始用“关系”来对照分析本国对外关系的时候,用关系理论的一般原理同自己国家的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是关系理论在他国实现本土化的过程,这个时候,“关系”这个概念就变成了一个国际学术概念。后来的学者再做关系理论的学术文献综述的时候,其追溯的源头就在中国。这三步的实现构成了理论国际化的完整参照过程。

由此,从有关机构,如出版社、学术期刊社、大学研究单位的出版和人才培养角度看,要实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外部世界的本土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化,就要有组织地重视以下几个基础环节。

第一,鼓励和支持国际关系学科各个领域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要主动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概念和学说纳入进去,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一些反映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出版社在这方面可以优先支持、精心策划这类具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风格、内容的系列图书和教材。

第二,高校国际关系专业应鼓励使用这类具有广泛接受程度的好教材,尤其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是在来华读国际关系专业学位的留学生中广泛使用。留学生是传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支重要力量,留学生来中国如果还是在学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而不是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等于我们在间接地帮别人传播知识,失去了我们大学传道的本义。这些留学生在中国大学课堂如果能够学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他们回国后就会把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带回去、翻译回去。改革开放以来,欧美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主要借助的是在那里读书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回国以后,积极主动地将他们的知识介绍到中国。现在我们需要改变这一知识交流不平衡的状况,就需要战略性地借助在华读书的留学生群体。

第三,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积极发现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研究问题的优秀成果,鼓励和帮助作者完善作品,以不同语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版和发行这些图书,从而拓宽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传播渠道。近年来,为了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家先后推出了“中华学术外译”、“经典中国”、“对外推广翻译计划”、“丝路书香”等多个资助计划,有力地推动了反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大国外交等领域著作的国际出版。

第四,要着力构建汉语国际学术共同体。现在不少高校追求学术成果的英语发表,并把英语发表作为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指标。这固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在推动英语发表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学术成果表达的语言主体性问题。历史上没有一个知识大国的知识生产是借助别人的语言来完成的,也没有一个知识大国是通过别国语言表达本国学术来成为知识大国的。中国学者可以利用英语发表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但也应该致力于打造中文期刊、出版社、大学研究机构的汉语国际学术共同体,鼓励我们培养的留学生用中文撰写论文,在中文期刊、出版社发表出版。中国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研究奖项,也可以颁给使用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来研究国际问题的外国学者。

结 论

本文主要根据出版界和期刊界发表的国际关系理论论著,概括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些特点和趋势。总体来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直保持着理论自觉,致力于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本文提供一个观察和展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从生产、建构到传播、扩展的过程。一种理论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其内容,而不在于其数量。因此,本文认为,形成一套由独特概念和方法构成的解释自身和世界以及他人和世界关系的理论体系,是关键的第一

步。由此形成的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的。本文界定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认为所谓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既是指中国长期以来在处理与世界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概念、理论和思想体系,也包括中国学者在研究其它国家与世界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到的概念、理论和思想体系。本文就此进一步指出,并不是中国学者就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全部创作主体,他国学者利用中国国际关系核心概念和理论研究自身与他国关系的成果,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一环。这一点,对出版社和学术期刊在培养外国作者群体上尤其具有意义。

中国特色既不意味着封闭排他,也不意味着其没有世界意义。要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从特殊转化为一般,就需要主动让更大范围的学者去使用、检验这个理论,使其合理地为他人所用,完成理论本身从特殊到一般的转化。苏长和将这一转化过程形象地比喻为“关键的惊人一跳”“理论从特殊到普遍的惊人一跳”,往往在于构成这个理论的关键概念,完成从描述某一特定现象的专有名词,扩大到解释更广泛现象的普通名词。当我们说某一理论是‘中国特色’的时候,这还只是思维的第一步,这种特色要具有世界意义,必须要迈出第二步,应该能够在解释外部世界或者在被外部世界接受的过程中,完成从专有名词到普通名词的升格,变得具有更广范围的解释意义。”因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化问题。在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化不是指接受欧美概念和理论就是国际化,而是指学术界、出版界、期刊界应该致力于将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如何推出去,让我们的理论成果更多地为世界接受和使用,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如何同外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在外国实现本土化的过程。

(作者简介: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编审,上海,200001)

收稿日期:2017年7月

(责任编辑:赵裴)

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7页。

The Features and Tendency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the New Century

Fan Weiwen

Abstract: This essay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trend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since the new century.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observe the process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production, 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first key point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is to construct unique concepts and methodology to explain the evolu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doesn't mean it is exclusive, or has no implications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Each particular theory c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local theory to global theory when it is tested and used by the outside experience. In this means, this essay advances the research agenda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suggests the detail methods on promoting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theories in the other areas studies.

Key words: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izations of Theory